

风雨年华

朱文远

1930--2000

风雨年华

朱文运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二〇〇三年六月

前 言

我的童年遭遇日寇侵略的灾难，我的青年时代，正值新中国建立前后的重大时期。建国前，我参加了解放战争的第二战线——学生运动；建国后又参加了首次国际战争——抗美援朝。我是在这些斗争中锻炼成长的。《风雨年华》这本集子，用回忆和文艺的形式，记述了那段时期的许多青年同志、朋友和烈士们斗争的生活片断，可引起老年朋友们对那段历史的回眸，也可使青年朋友们了解一些那时的历史情况。为他们的人生道路提供一点参考。

2003年6月1日

目 录

前言	(1)
----------	-----

第一部分 多事童年 艰难学运

第一次流浪	(1)
第二次流浪	(3)
搜查	(6)
警告	(8)
寂静山城的春雷	(9)
心照不宣	(15)
贵阳“双十一”惨案(电视片脚本)	(17)
巾帼芳魂(党史电视文艺)	(30)

第二部分 初上战场 战争感悟

再见吧祖国(诗)	(93)
轰炸	(94)
“楚河汉界”与“三八线”	(95)
七天七夜	(97)
遭遇	(98)
泉水	(99)

战地浴室	(100)
难忘的“三八线”	(102)
停战前夕的一次战斗	(106)
战火中的女战友	(109)
歌声(诗)	(112)
柔中寓刚	(114)
三年激战(诗)	(117)
老人的话(诗)	(118)
走上战场的思考	(119)
每当我们路过这里的时候	(123)
崔莹长大了	(126)
忏悔(诗)	(128)
运动会(诗)	(129)
国际之光	(130)
招手	(133)
再见吧亲爱的妈妈	(135)
战争的必然产物	(137)

第三部分 良师挚友

忆冯老	(141)
忆向一	(143)
忆汝健	(145)

第四部分 居安思危

西方狼崽	(146)
东方狼魂	(149)
再看50年前朝战史	(153)
后记	(156)

第一次流浪

我小时候很胖，又有些蛮劲，我的小名就叫“大蛮”，有一次我看到家里的一个玻璃小座钟机心在里面转，很好奇，就把它全拆开，再也装不还原，家里人没有责怪，还得到姑姑的赞许。小学一年级时听老师讲日本鬼子欺负中国人我就把自己的一个装满了钱币的储蓄罐送到学校，捐献抗日，受到老师的称赞。祖父最喜欢我，他临终时我不在他身边，他还总念着“大蛮……”，他圆圆的脸，带着眼镜，小学时我喜欢画画，就看着祖父的照片画了张很大的头像，只画了头、脸，没画脖子和衣服，下面是“大蛮”两个大字，家人们都说这样不完善，我却认为很好（当时还不懂得这是坚持个人的艺术爱好）。我小学三年以前是在贵阳有名的“达德”学校念书。黄济生和王若飞在达德学校任教时，提倡演文明戏（话剧），我还作为小演员上了台。

父亲早年从上海读书回来后，就在贵阳市中心大十字开了“青鸟书店”，暗地卖一些进步书籍。我每天放学都去看书。大人的书我看不懂，就看各种画册，我最喜欢风景画和木刻人像。

1939年2月4日，日本帝国主义的飞机轰炸贵阳，全城几乎烧光，我们的家和父亲开的“青鸟书店”全被炸毁。父亲破产了，全家搬到了乡下，母亲在乡村小学当教员。1944年秋，日本打到贵州独山，我们全家随父亲工作的盐务公司的车队逃到毕节。第二年春，我与毕节弘毅中学一年级的同学瞿大明两人私自离家，

想到重庆（中华民国的陪都）去考国立学校。临行的那天早上，我二弟文遂送我到城外，我说到了重庆能上公立学校就来信叫他也去，他悄悄塞给我他仅有的几毛钱。我们爬上了国民党的军车，车上早有些“黄鱼”（搭军车的旅客），中午吃饭时，车上的人都下去在馆子吃饭，只剩下我们两个小孩没下去，他们上来问明情况后，就给司机说，这是两个穷学生，想到重庆考公费学校，司机就没要我们的车钱，把我们带到了重庆。在重庆街上，没钱吃饭，只是买了些干蚕豆嚼着填肚子，渴了就在街边施茶亭里喝点凉茶。晚上走到沙坪坝重庆大学，去找中学时的一位老师，希望得到他的帮助，哪知他已不在学校。我们只好返城，走到小龙坎，实在走不动了，就在一家茶馆坐下来歇气，店里的老板见两个年小的穷学生很奇怪，问明情况后就说，你们两个先在这里的两家皮鞋店里打打杂工，有碗饭吃，慢慢再说。就这样我在一家皮鞋店里当了小学徒，每天扫地，学干些杂活，师傅做皮鞋，要在鞋模上钉钉子，拨下的钉子，随手丢在地上，我要用吸铁石将它们收拢来，再用钉锤敲直，这要花很多时间。有一天要我下到坡脚江里去挑水，第一次挑着水桶爬坡，累得坐下来哭。

8.15 日本投降后，我家已从毕节回到贵阳，父亲来信要我回到贵阳上学。这次流浪，使我走出贵州的大山，开阔了眼界，感到外面的世界很大，同时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生活，就不怕再踏入社会了。

第二次流浪

1945年秋冬，昆明的姨父、姨母见我们家三个孩子上学困难，就把我带到昆明，在他们开的“宝昌汽车材料行”里当练习生（学徒，卖汽车材料），晚上我就到夜校补习功课。

这时正值昆明暴发“一二·一”学生运动，李公朴先生和闻一多教授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被国民党特务暗杀，四位大学生被特务杀害，这些烈士的事迹打动了，使我的思想从想自己跳出来看社会，关心国家的大事，再看了一些进步书籍，我就接受了革命思想的启蒙。这时我先后画了三幅漫画，连着在昆明《民主周刊》上发表。第一幅是“勘察”，当时国民党政府派大员徐勘到昆明视察银元券换银元的事。我在画面上画了一架飞机，里面坐着国民党官员（人头特写），飞机后面的风卷起一串串银元，意思是国民党大员视察却把人民的银元卷走了。第二幅是“节约”画面中间是一个肥头大脑的官员，端着盛满葡萄酒的玻璃杯，旁边有一辆小轿车，车顶上躺着一个裸体美人，另一边是一群穷困的老百姓，意思是讽刺政府提倡的“节约”就是这样。第三幅是“吸血鬼”，画面是一张钞票，票中是一个骷髅，一根吸管伸向旁边枯瘦如柴的穷人身上。意思是说，国民党用滥发钞票不断贬值中吸干人民的血汗。图外还配有诗。三幅画的署名都是“大蛮”。我送稿到编辑部去时，他们很惊讶的看着我说，原来你是个年轻的学徒。

后来，姨父母见我好学，就让我去上正式的学校，我经过补习，考入了建民中学高一。（后来得知建民中学是地下党主办的学校，师生员工多是很进步的）。在这里我直接听到了国内外形势的讲话和国统区、解放区的各种信息，看到了一些进步的书籍和文章，留给我印象深的是《死在战场外的中国兵》等诗歌，在这里我第一次参加了合唱团，受到了这种优美高雅进步的培养集体主义精神的教育。后来我又被选为班主任（班长）使我第一次得到了做群众工作的锻炼。我过去只会画画，不会写文章，语文老师很会启发人，让我对作文发生兴趣，并不断进步，我的作文逐渐由“乙”上升到“甲”，每周从郊外蓝龙潭回来，都送给姨父母看，表现自己的成绩和进步。在这里我多次参加了昆明学生的反饥饿争民主的游行。建民中学和云大附中成为昆明学生运动走在最前列的学校。

1948年，我转考入昆华师范艺术科，一是读师范是公费，不交学费和伙食费，二是热爱艺术。一同转来的有李英明、李非、刘光裕等同学，大家与昆师的进步同学组织了全校性的学生团体“火把社”，我被选为宣传股长，还参加演出了《他为什么活着》的话剧。

在一次大的学生运动以后，我们急切感到需要到解放区去接受教育，但从内地走，正在打仗难过去，就想到从越南到香港可能会好走些，或者到滇南参加游击队。于是几个同学就相约南下，当我们走到中越边境的河口镇时，对面也在打仗，每天见法国飞机在河那边飞行。这里走不通，游击队也没找到（后来据说朱家璧的队伍转到越南莱州整训去了）我们只得在当地留下，另谋出路。刘光裕留在河口小学教书，我和张林转走马关县。最后我一人到了马关的八寨岩脚小学教书。这个村子人家不多，在一间较大的屋里摆上桌椅、黑板就是学校，学生十几个，但从一到六年级都有，我一个人教，校长是镇上的一个年轻人，他的文化不高，

他要我教他分数，从分子、分母教起，他很感谢我，对我也不错。学费是到各家各户去收，当村长带着我到后坡上一家破草屋去时，里面什么家具也没有。两夫妇和两个小孩都衣不蔽体。村长要他们也出一份学钱，我心里真是一股说不出的滋味。每天上课时，那两个小孩就躲在窗外偷偷地看，我想叫他们也进来学习，他们不肯，我也没有好的办法，总感觉世道不公。

这些地方，人们说有瘴气，我也顾不了，只是后来生了疥疮，长了脓泡，没办法，又只好回昆明，这第二次的流浪生活，使我更贴近社会，看到了更多的不平事，感到了投身革命的迫切性。

搜 查

回到昆明，我们几个离校的学生，已被昆师开除，学校回不去，只好回到姨父母家里，他们对我没有什么异议，就介绍我到昆明汽车材料行同业公会里当文牍（文书），我在这里才有了治病的条件。

1948年秋冬，父亲来信要我回贵阳继续上学，是为了有个高中毕业文凭才好找工作。姨父母也怕我在昆明参加地下活动被特务抓走，就送我回贵阳读书。

回到贵阳，父亲是在友昌商行当会计，我们家就住在商行（经商加客栈）最后一层的楼上。我则积极在老同学中活动，介绍昆明学生运动的情况。

有一天晚上，茶房（服务员）跑到后面来打招呼说，前面来人检查了。我一个人住在最后的楼上，我打开书，装着看书，不知什么时候我身后悄悄来了一个人，当他上前翻查我桌上堆的书时，我才看清，是一个全身青色制服的中年人。他翻出的书除了一些高中的课本外，还有一本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那是当局大肆宣传要民众读的书，这也是我事先有意的摆设。

他查看了书桌，又回头观看房屋四周，当他转到后面阴暗处时，那时的电灯不亮，没仔细看下去，我有些紧张，待他走后，我松了一口气，赶快跑过去查看一棵大木柱，上面有个四方的空洞，外面是用一块木头堵着的，我打开伸手一摸，心里冷了一下，里

面是空的，放在里面的材料没有了。这些材料有我从昆明带回来的《民主周刊》，上有我漫画稿的剪报，有解放区的进步歌篇，还有一些学生运动的资料，最使我担心的是，来贵阳后参加秘密革命青年组织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的盟章，是一个黄色土纸油印的小本，在订书针后面的夹缝里写有我的盟员编号，这是最要紧的。

这些东西到哪去了？我正在焦虑着，父亲从隔壁屋里走来，他轻声对我说，你那些东西我丢到厕所的茅坑里去了，我心里又惋惜又感激，父亲又问我，你参加了个什么组织？我明白父亲已看过那些材料了，我说不能讲，他说，连你父亲都不能讲吗？我说，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情，父亲不再说什么就走了，我知道父亲是一个同情革命的知识分子，他也有许多不满现实的话不便对我说。从此他很少过问我的事情。由于家庭经济困难，二弟停学去当了学徒，我的学费则由几个要好的同学司永龄等给我拼凑，勉强把高三读完。

警 告

1949春我考入西南中学高三上学习，西南中学是国民党的一位高级官员办的私立学校，在蒋管区此起彼伏的学生运动中，这个学校一直很沉闷，闻不到新鲜的空气。我在竞选学生自治会主席的演讲中，言词过激，在出黑板报时也如此，引起了校方的注意。有一天被叫到训导处去，办公室里就训导主任一个人，她是一个瘦小的老太婆，一开口就严厉的训斥我，说：朱文运，我看你是带有任务到学校来的，你要小心点！

从此，我不在这个学校出头露面，转向省立贵阳中学活动。贵中高三有我许多小学和初中的同学，比较熟，容易活动，成了一个“不是贵中的特殊的学生”。四月下旬，贵中和其它几所省立中学联合举行了“贵阳省立八校反饥饿游行”，这是贵州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显示了贵阳青年学生的觉醒，是山城迎接解放的春雷。

刚一解放，我就离开西南中学，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不久得知，西中的那位训导主任，瘦小而严厉的老太婆，被周恩来总理接到北京去了，至此，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她对我的警告，是非常关切的保护。可惜后来再也没有见着她了。

寂静山城的春雷

解放前，我在昆明上学，参加了多次学生运动，受到了革命思想的启蒙，也初步认识了学生运动的意义。

1948年冬，我回到贵阳，感到贵阳的政治空气与昆明不大一样。昆明的学运很活跃，贵阳则是一片沉寂。后来一了解，才知道贵阳是蒋介石的反共大后方，这里特务横行，一片白色恐怖。

再和一些老同学接触以后，感受又不同了。原来这座沉静的山城，并不平静。

早在30年代，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经过贵州就播下了革命的火种，贵州很早就有了中共地下党的组织。抗日战争爆发后，外来大批流亡学生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新的文化和先进的思想。记得我从小一上学就进的达德学校，是老教育家黄齐生曾经任教，和老革命家王若飞就读过的学校，很早就开始演出“文明戏”（现代话剧），我还当小演员上过学校院子里的剧台。

贵阳有八所省立中学。在几个主要的学校里很早就有中共地下党支部。老一辈革命家秦天真、刘雪苇、李策、徐健生、蓝芸夫、熊蕴竹、蓝运藏、黄奇鑫等都曾在这些学校里进行过革命活动。许多进步的老师如田君亮、朱穆伯、高滔、蒋蔼如等，都曾经在这些学校任教。他们向学生进行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的思想教育。抗日战争期间，许多学生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团体骆驼话剧社和筑光音乐会。有的学生因从事革命活动而英勇牺牲在

反动派的屠刀下。有的则奔赴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贵州的学生运动是有光荣传统的，但也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

1948年秋、冬，中国的解放战争进入高潮，作为革命战争第二战线学生运动，在蒋管区也风起云涌。青年学生接受革命思想快，满腔激情，为了理想，敢于赴汤蹈火。在南京、重庆、昆明等地学运的影响下，贵阳的学运也在蕴酿之中。在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以及八个省立中学：贵阳中学（贵中）、贵州高级中学（省高）、贵阳女子中学（女中）、贵阳师范学校（贵师）、贵阳女子师范学校（女师）、贵阳高级工业学校（高工）、贵阳高级农业学校（高农）、贵阳高级医士职业学校（高医），以及私立清华中学、中山中学、西南中学等许多学校已有地下党、团的活动，不少学生都参加了地下党领导的秘密读书会（小组）。

当时，中共地下组织在白色恐怖下，只能秘密活动，有严格的纪律，许多事情特别是全局的情况是解放后，公开了秘密才清楚的。那时贵阳的地下党有两个组织，一个是1948年秋，中共中央南方局先派张立和刘镕铸同志到贵州，建立起贵州省工委，其后又派姚重华、安毅夫、梁燕和黄培正同志到贵阳，建立中共贵阳特别支部，以后特支又增加了朱厚泽同志。两个组织不发生横的关系。1949年初，省工委在贵州一些地方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新青”），贵阳特支也在贵阳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新联”）。两个秘密的青年组织都在贵阳的大学、中学和一些工厂，机关以及店员中展开宣传教育和组织工作，并通过学生中的一些进步团体、小组，团结了许多同学。

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刮民脂民财用于打内战，物价飞涨，使得民不聊生，历来清贫的教师阶层更是处于水深火热之中。最早是贵大的同学们发出了“静辉村（教授住宅区）的孩子们上山挖野菜充饥了，我们怎么办？”的呼吁，靠公费生活的学生也处于饥饿之中。接着一场反饥饿的烈火在久旱的干柴上，燃起了熊

熊火焰。

地下党鉴于贵州反动势力统治严酷，不利于搞大的学生运动，主要是积蓄力量，迎接解放。但群众运动已经起来了，就得因势利导，使运动顺利发展，避免更大的损失。

1949年3月26日，贵州大学一千多学生从花溪步行到贵阳举行反饥饿游行，高喊“抢救师生员工生活”的口号。学生自治会主席朱文达在贵阳大十字中心岗亭上，宣读了游行请愿的宣言。贵阳师院的同学也起来了，在校内进行了反饥饿游行。贵大和师院都是贵州的高等学府，在学运上起着率先的作用。

在此同时，省立八校的教师已有两个月没有得到薪水了。许多教师在何锡周、肖之亮、熊永福、李显光、杨文典、黄祖滢、陈振标、唐秉权、区作霖等老师的发动下，成立贵州省立八校教联会，向当局请愿。请愿没有结果，许多教师都不来上课，学校处于停课状态。

在贵中，虽然反动派控制很严，但刘方岳、何锡周、杨世济、王亚功、许庄叔等老师不畏强暴，经常向学生灌输爱国民主思想。“新联”成员丁颖（由重庆回来，化名王英）、在贵大的殷以温，在西南中学的朱文运和在贵大的“新青”成员高言善汇同在贵中的“新联”成员殷以文、赵柏林在贵中一起活动。因为贵中是当时的模范中学，又处于市中心，便于活动。“新联”活动的据点是在护国路27号殷家。殷家是深宅大院，便于隐蔽，殷家父辈开明，不干预学生在他家的活动。当时“新联”和“新青”的成员虽碰在一起，没有公开组织身份，但都心照不宣。丁颖还另与生病切除双腿在家的贵大同学“新联”成员杜蓉联系，通过杜蓉又联系了一批贵中和中山中学的女同学。丁颖还在贵中单独联系了王珏等同学。“新联”成员朱文运在贵中，又发展了高三的同学司永龄、吴定猷、刘绍明、安我正、殷以柔为盟友，通过读书会，诗歌朗诵会和郊游歌咏会等活动，团结了许多同学。通过这些同学的努

力，在选举中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成为领导全校学运的核心。学自会又派出一些同学分头到其它省立学校联系。

在女师，党组织通过“新青”成员刘玉珍、何伊长积极开展活动。她们又联系了杨景贤、左骥等进步同学掌握了学生自治会。

在贵师，地下党联络站的成员毛祖坎，以读书为掩护进行活动，她通过王全章等同学，也掌握了学生自治会的领导权。

在女中任教的于世沅、贾仁华、周杏村等都是爱国民主的老教育家，对学生很有影响。共产党员刘家祥是女中的毕业生，她通过音乐教师乐锦霞在女中展开工作，进步同学也掌握了学生自治会。

贵阳高中的校长刘薰宇是国内著名的数学教育家，是爱国民主的老学者，因此高中的民主空气较浓厚，学生活动也较自由。

省立八校在贵州大学反饥饿游行的带动下，也行动起来了。“老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成为广大同学的共同呼声。女师同学左骥写出了《不能让教师在黑板前默默地倒下去！》的文章。各校都出现了要求改善教师生活，要求正常上课的传单和壁报，反饥饿的歌曲响彻各校校园。传单、小旗和各种宣传品、漫画也在各校宿舍和一些同学家中赶制。贵中的一部分小旗是在刘君卫家做的，大家一直忙到深夜。另一些同学在殷以柔家的后仓里赶制小旗和印刷传单，大家心情异常兴奋。刘宗龙不禁低声唱出：“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大家低声应唱，准备“作一次最后的斗争！……”。朱文运用木板刻了一幅鲁迅像，下面是一支笔似的矛，刺向黑暗，受到刘方岳老师的赞许，在同学中传看鼓舞斗志。又画了一些反饥饿的漫画，游行时贴在大十字街上。

1949年4月16日，一个贵州学运史上，规模最大的学生运动，在“老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的口号声中开始了。上午，省立八校队伍陆续在大南门汇合。高工的同学是天一亮起来，喝了点稀饭就从郊外赶来的。贵师同学是不顾学校当局的阻挠，冲出校